心理科学进展 2021, Vol. 29, No. 3, 505–519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x.doi.org/10.3724/SP.J.1042.2021.00505

幸灾乐祸的重新审视和互动过程模型的构想*

张　衍[1]　王俊秀[1]　席居哲[2,3]

([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北京 100732) ([2]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62) ([3]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200335)

摘　要　幸灾乐祸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情绪, 但却是一个远未研究透彻的领域。以往研究将幸灾乐祸视为一种不道德的情绪,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其有一定的正向意义并循此展开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全面梳理, 对幸灾乐祸的概念与测量方法的总结及对现有研究的整合, 构想了幸灾乐祸的互动过程模型。该模型的优势在于基于互动视角融合了互动双方(自身和他人)因素, 并基于过程视角明晰了幸灾乐祸发生的过程和发生后的变化。该模型指出今后研究者应关注幸灾乐祸前后事件的发生情境和情境中的多方互动, 并希冀对其他社会情绪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键词　幸灾乐祸, 互动过程模型, 社会情绪

分类号　B849: C91

在他人遭遇不幸时感到开心, 这种称作“幸灾乐祸”的情绪被认为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 早在公元前国内外就已有对其的记载。然而, 虽然“幸灾乐祸”一词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被使用,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常用词, 但我国有关幸灾乐祸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用“幸灾乐祸”为主题在知网、万方和维普上搜索, 仅搜到十余篇相关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幸灾乐祸的影响因素, 如抑郁(陈抗, 2017)、自我肯定(陈智勇, 2014)、社会认同(冯夏影, 2015)、妒忌(李翠, 2019)、喜爱或愤恨(赵轶然, 2015)、责任归因(张爱卿 等, 2004)和群际关系(朱千林 等, 2020)等。有两篇文章探讨了幸灾乐祸的后果, 其对人际信任(高红梅, 李萌, 2018)和帮助意愿(张爱卿 等, 2004)的影响。另有桂菲菲(2010)研究了幸灾乐祸的脑机制, 发现其与 P200 成分有关。可见, 国内对幸灾乐祸的研究积累不丰、未成体系。

国外研究虽数量较多, 但实证研究于 20 世纪末才开始起步, 尚未形成具有整合性的体系。从过程角度, 相关研究可以分成幸灾乐祸前和幸灾乐祸后两部分, 前者探讨的是影响幸灾乐祸情绪的因素, 后者探讨的是幸灾乐祸的后果。从互动角度, 已有研究则可以分为对幸灾乐祸方的研究, 和对遭遇不幸方的研究。但是, 这些研究(包括综述)也总是将时间先后顺序与互动两方混杂在一起, 未能厘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更鲜有研究将影响因素与后果综合起来考虑。现有的理论和模型(如社会比较理论等)则仅关注某一小部分影响因素和后果。本应构成一个大致完整链条的研究领域, 目前的研究点却仍是散在的(曹红蓓 等, 2012), 这是推进幸灾乐祸研究需要突破的瓶颈。

这个话题之所以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方面是因为幸灾乐祸的普遍性与相对研究不足的矛盾, 另一方面缘于其似兼具“邪恶”与“正向”的意义属性。本文在学界已有幸灾乐祸研究发现的基础上, 综合多方面研究证据, 初步提出了一个互动过程模型, 旨在以一种互动和动态的过程视角来分析和综合幸灾乐祸的相关研究, 并希冀藉此模型尝试厘清幸灾乐祸的发生过程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并提示从过程和互动的整合视角来研究幸灾乐祸。此外, 与已有相关文献(如：曹红蓓 等, 2012)

收稿日期：2020-07-28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2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SH129)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2017BSH004)资助。

通信作者：席居哲, E-mail: jzxi@psy.ecnu.edu.cn

不同之处在于，本文试图超越幸灾乐祸的“邪恶观”，并不认为幸灾乐祸是一种邪恶情绪，而尝试以一种更中立的视角总结从古至今对幸灾乐祸的哲学观点，并进一步廓清幸灾乐祸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且以过程性的视角总结了幸灾乐祸发生和调整机制，希冀为学界提供研究参考框架。

1 什么是幸灾乐祸?

1.1 幸灾乐祸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幸灾乐祸从字面上理解即是在他人遭遇不幸时感到开心。它是一种社会情绪，既可以是人际间的情绪，也可以是群际间的情绪(Leach & Spears, 2008)。从西方词源看，英文的幸灾乐祸 Shadenfreude 一词源于德语(Heider, 1958)，英文中并没有幸灾乐祸一词(Pietraszkiewicz, 2013)。然而，没有这个词并不代表没有这种情绪。现有研究表明，幸灾乐祸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情绪(Black, 2018)。英语中另有一个词也用于表示幸灾乐祸：gloating。但使用 gloating 时，幸灾乐祸者是造成他人不幸的原因，类似于沾沾自喜加幸灾乐祸；而使用 Shadenfreude 时，幸灾乐祸者并不是造成他人不幸的直接原因(Leach et al., 2015)。要注意的是，无论在中文或英文语境下，研究者在使用幸灾乐祸或 Shadenfreude 时，并未将幸灾乐祸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点考虑进去(例如：Shamay-Tsoory et al., 2009)。然而，Leach 等人(2015)发现这两者在体验和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因而，今后研究需要对此更明确，或者在研究时对幸灾乐祸者的作用进行区分。

此外，与幸灾乐祸有关的概念有：(1)单纯的开心(joy)。研究发现从面部表情和面部肌电图上，单纯的开心和幸灾乐祸似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被试自我评价在幸灾乐祸时开心的程度较低，但肌电图却提示其开心程度更高，这说明幸灾乐祸可能是一种更内隐的心理活动(Boecker et al., 2015; 向晋辉 等, 2005)。(2)乐他人之幸(freudenfreude)。这种情绪与幸灾乐祸一样都是开心，但前者是因为别人的幸事而开心，与合作有关；而后者是因为别人的不幸而开心，与竞争有关(Chambliss, 2016; Chambliss & Hartl, 2016)。(3)伤他人之幸(Gluckschmerz)。学界倾向于认为该情绪与幸灾乐祸有别，前者是对他人之幸感到难过，后者是对他人之不幸感到开心，研究发现，更易幸灾乐祸的人也更易有伤他人之幸(Hoogland et al., 2015)。(4)同情(sympathy)和共情(empathy)。这两种情绪都是对他人之不幸感同身受，因此有很多研究者将这两种情绪与幸灾乐祸看成是相对立的关系(例如：van Dijk et al., 2009)。研究者倾向于将上述几种情绪与幸灾乐祸进行比较研究，然而，这些情绪是否与幸灾乐祸是相互影响或有所关联？例如，对他人以前之幸感到难过的情绪越多，越有可能在他人不幸时感到开心；而共情则可能抑制幸灾乐祸。

总的来说，幸灾乐祸的定义并不是很清晰，相关概念也颇多，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细化其定义，厘清幸灾乐祸与相关概念的不同与相互作用。

1.2 幸灾乐祸是“邪恶”的吗?

对幸灾乐祸的内涵认识及概念界定会受到哲学观的影响，简要回顾幸灾乐祸哲学观的嬗变历程，有利于理解幸灾乐祸的概念及其演化。关于幸灾乐祸的哲学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46 年，《左传·僖公十四年》中记载“幸灾不仁”，即认为幸灾乐祸是不仁的。公元前 350 年的西方，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幸灾乐祸是一种恶意的情绪，这种观点某种意义上对后来学界的研究起到了价值定向作用，从而倾向于将幸灾乐祸看作是“邪恶”的。直到 19 世纪末，尼采开始将幸灾乐祸当作一种中立的情绪，不带有道德评价地分析。到了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为幸灾乐祸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并且它有积极的意义(Wang et al., 2019)。

以下有两种关于幸灾乐祸的意义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幸灾乐祸有利于保护自己或所在群体的自尊心。许多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发现低自我评价的人更容易幸灾乐祸(例如：Feather et al., 2013)。这部分将在后续详述。

第二种观点采用了进化的视角，关注于自我的择偶价值。它将幸灾乐祸当成一种择偶价值追踪机制(mate-value-tracking mechanism)，认为当看到竞争者遭遇不幸，且这种不幸会降低竞争者的择偶价值时，人们会感到更开心。因为进化论上认为，女性的择偶价值与外表的吸引力有关，而男性的择偶价值与社会地位有关。因此，该观点认为，当女性竞争者在外貌上遭遇不幸时，女性会感觉更开心；而当男性竞争者在社会地位上遭遇不幸时，男性会感觉更开心(Colyn & Gordon,

2013; van Dijk, Ouwerkerk, & Smith, 2015)。

本文认为，这两种对幸灾乐祸不同的哲学观点是从不同视角出发的。以前将幸灾乐祸看作是不道德的情绪，是从社会层面出发，强调幸灾乐祸对他人的影响；现在将幸灾乐祸看作有其积极意义，是从个体层面出发，强调幸灾乐祸对自身的影响。然而，幸灾乐祸虽于个体有益，却仍可能于社会有害。这需要研究者对幸灾乐祸的后果进行探讨，可惜的是这部分研究相对较少，对此将在后续进行详述。

1.3　幸灾乐祸如何测量？

幸灾乐祸的测量方法取决于研究者对其所作的定义。很多研究者将幸灾乐祸当作是一种情景性情绪，因此设计出一些他人遭遇不幸的场景，然后测量被试的情绪。这里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设计他人遭遇不幸的场景。常见的方法是使用虚拟场景，例如让被试看一段他人遭遇不幸的视频、图片或文字描述(Greenier, 2018)。然而，这样的方法生态效度有限。Gonzalez-Gadea 等(2018)的研究发现相比虚拟场景，在真实场景下，被试展现出了更多的幸灾乐祸情绪。Greenier (2018)发现在虚拟场景下，人格与幸灾乐祸有关，但在真实场景下，没有发现这样的关系。这些研究提示，研究结果受到研究方法的影响，今后需要有更多在真实场景下的研究。另一方面，多数研究者仅操纵了不幸的场景，然而，后续将提到，幸灾乐祸的发生过程不止与不幸场景有关，还与较早前双方的联结期(见下文)有关，但研究者对联结期双方的互动却较少操纵，这不利于明晰幸灾乐祸的整个发生机制，今后研究须对此进一步开展探究。

第二个研究步骤是测量情绪，多采用问卷法，让被试在情绪维度上进行评分(通常为 7 点评分)。但是，不同研究者所测量的项目不尽相同(表 1)。总的来说，有 3 种方式：(1)直接测量幸灾乐祸；(2)测量与开心有关的各种情绪，如开心(happy)、高兴(pleased)、满意(satisfied)、喜欢(like)、搞笑(funny)、令人发笑(amused)、享受(enjoy)、微笑(smile)、大笑(laugh)、松了口气(relieved)等；(3)测量与幸灾乐祸相对立的情绪，将其反向计分，如难过(sorry)和同情(sympathic)等。

还有研究者将幸灾乐祸当作一种特质，认为幸灾乐祸不仅会因场景而不同，也会因人而不同。Krizan 和 Johar (2012)编制了习惯性幸灾乐祸量表(Chronic Schadenfreude Scale)，包括 6 个项目，7 点评分，例如：“有时看到别人失败我会感觉较好”。在此基础上，Crysel 和 Webster (2018)编制了特质幸灾乐祸量表，包括 12 个项目，9 点评分，将幸灾乐祸分成善意的(benign)和恶意的(malicious)两个维度。他们认为善意的幸灾乐祸是无害的，可能只是对别人的尴尬感到好笑而已；但恶意的幸灾乐祸是当他人遭遇较大的痛苦时仍然感到开心，这可能是有害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善意或恶意的幸灾乐祸的区别，似乎是从不幸的严重程度上来区分的，且这中间暗含着研究者的一种价值观，即在别人小的痛苦上幸灾乐祸是没关系的。Pietraszkiewicz 和 Chambliss (2015)编制了乐幸乐祸量表(Freudenfreude and Schadenfreude Test, FAST)，包括 16 个项目，测量了被试在 4 个方面(人际关系、学业、工作和外貌)和 4 种情况下(共赢、共输、自己赢和对方赢)的开心情绪，4 点评分。例如：“如果朋友的身材走形了，而我没有，我会感到……” (乐祸)；“如果朋友升职了，而我没有，我会感到……” (乐幸)。

表 1　测量幸灾乐祸情绪的文献举例

3 个项目		4 个项目		5 个项目	
Leach & Spears (2008)	开心、满意和幸灾乐祸	Brambilla & Riva (2017a)	开心、微笑、令人发笑、享受	van Dijk et al. (2006)	满意、喜欢，微笑，大笑，幸灾乐祸
Schulz et al. (2013)	开心、搞笑和难过	Powell & Smith (2013)	令人发笑，高兴，微笑和满意		
Berndsen & Feather (2016)	高兴、令人发笑和微笑	Leach et al. (2003)	满意、开心、松了口气、幸灾乐祸		
Feather & Naim (2005)	开心、高兴和满意	Abell & Brewer (2018)	令人发笑、满意、高兴、同情的		

可见，不相统一的测量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尽相同的研究结果。这种局面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检测不同研究方法下结果的稳定性，但显然也造成了比较研究和领域统合的困难。此外，也应注意研究者的价值观对测量方法和条目的影响。

2 为什么会幸灾乐祸?

许多研究者探讨了影响幸灾乐祸的因素及其发生机制，本文对这些研究方向及其结果进行了分类与整合。首先，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幸灾乐祸至少涉及两方：幸灾乐祸方和遭遇不幸方。因此，本文融入了互动的视角，对源自不同对象(幸灾乐祸方和不幸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离与梳理。其次，本文根据影响因素间的关系，采用过程的视角，将幸灾乐祸的发生机制分成 3 个阶段：自我认同期、联结期和幸灾乐祸期，各阶段所包含的影响因素结构如表 2 所示。

表 2 三个阶段中幸灾乐祸影响因素的结构

阶段	分类	影响因素
自我认同期	幸灾乐祸方的自身特征	性别
		年龄
	幸灾乐祸方的自我认同	人格特质
		自我评价
		疾病与神经系统
联结期	对不幸方的前期认知评价	社会比较
		刻板印象
		前期之幸的应得性
	对不幸方的前期情绪	嫉妒
		厌恶类
		憎恨类
	人际或群际关系	人际或群际关系
		内群体认同
幸灾乐祸期	对后期不幸的认知评价	应得性
		合法性
		责任性
		故意性

2.1 自我认同期

Frijda (1988)认为，对他人遭遇的不幸感到开心，能满足人们与自我相关的动机。因此，幸灾乐祸的发生是与幸灾乐祸方的自身因素有关的。在研究时，自身因素如性别、人格、抑郁等往往是先期就存在的。正如 Feather 等人(2008; 2013)将自身因素当作是前期因素一样，在此，本文将自身因素当作幸灾乐祸发生的第一个阶段，称为自我认同期，并将其分成了自身特征(主要指人口学特征)与自我认同两部分。具体见表 2 所示。

2.1.1 幸灾乐祸方的自身特征

此处，幸灾乐祸方的自身特征主要指的是他们的人口学特征。但可惜的是，专门探讨幸灾乐祸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仅集中在性别和年龄两个方面。在年龄上，发展心理学相关研究发现, 2 岁的小孩就已经有幸灾乐祸的迹象了(Shamay-Tsoory et al., 2014)。但 Schulz 等人(2013)研究了 4~8 岁的儿童，发现幸灾乐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根据这两个研究，可以推测，幸灾乐祸的发展可能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但现有研究仅能说明幼儿就有幸灾乐祸的情绪，却不能描绘出它的发展过程和阶段。例如：4 岁是否处在幸灾乐祸情绪的顶峰(即分水岭)? 4 岁之后幸灾乐祸的减少是线性的吗？什么时候幸灾乐祸的情绪不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更多研究来厘清。

在性别上，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桂菲菲, 2009)。有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体验到更多幸灾乐祸(如: van Dijk et al., 2005); 但也有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体验到更幸灾乐祸(如: 李翠, 2019); 不过也有研究未发现性别差异(例如: Schulz et al., 2013; 向晋辉 等, 2005)。择偶价值追踪机制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同性更容易幸灾乐祸(van Dijk, Ouwerkerk, & Smith, 2015); 然而 Watanabe (2016)发现，男性确实如此，但女性更易对异性幸灾乐祸。究竟是不同性别的人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敏感性不同，抑或确实存在性别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此外，还需要更多研究探讨其他人口学特征，如职业、教育程度等对幸灾乐祸的影响。而现今跨文化研究也仅证实了幸灾乐祸是一个普遍的社会情绪，但不同国籍和文化是否对幸灾乐祸的程度有影响，也是未来幸灾乐祸的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

2.1.2 幸灾乐祸方的自我认同

此处，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它与个体的人格、疾病和自我评价都有关(吉登斯, 1998; 洛克, 1959)。相对于研究结果在自身特征上的不确定性，关于

幸灾乐祸方自我认同对幸灾乐祸影响的研究，虽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取得了一些一致的结果。

首先，人格相关研究发现暗黑人格(马基雅维利主义或称嗜权性、自恋、施虐和精神病态)与幸灾乐祸显著正相关(Porter et al., 2014)。然而，不一致的是，Lee (2019)发现当面对的是丧亲者时，精神病态和施虐人格的人仍然会幸灾乐祸，而自恋和嗜权人格者不会，他们更多感到的是厌烦。这可能与前两者的人格更黑暗有关，因而当他人遭遇较大不幸时，他们仍然会感到开心。此外，Greenier (2018)发现在虚拟场景下，暗黑人格与幸灾乐祸有关，但在真实场景下，两者却没有显示出关联。这说明暗黑人格与幸灾乐祸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研究证据的支持。除暗黑人格外，还有研究者发现更具竞争性(Chambliss, 2016)、复仇心和愤怒特质(Sawada & Hayama, 2012)，以及不安全型依恋(Baren, 2017)的个体更易幸灾乐祸。但是，因为这些人格相关研究更偏向于将幸灾乐祸当作一种不道德的情绪，它们探讨的多是消极的人格特质与幸灾乐祸的关系。然而，这中间暗含了研究者的自身价值观，研究结果也可能受到实验者效应的影响。若研究者将幸灾乐祸当作一种中立的或积极的社会情绪，那么它与其它人格特质，如内外向、开放性等的关系是什么？在普通人当中，它是否也可能与某些积极的人格特质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次，Ouwerkerk 和 van Dijk (2008)认为幸灾乐祸与自我评价有关，他们的研究发现自尊心较低的人更容易幸灾乐祸，尤其是当他人遭遇不幸的方面与自己在意的方面有关时。这两位学者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都证实了自我评价与幸灾乐祸的关联甚密(例如：Feather et al., 2013; van Dijk et al., 2012; van Dijk, Ouwerkerk, Smith, & Cikara, 2015)。一种解释是，自我评价低的个体感到自身受到威胁，幸灾乐祸作为一种保护自己的防御机制，能使他们重新肯定自己(陈智勇, 2014; van Dijk et al., 2011; Watanabe, 2016)。另一种解释是，幸灾乐祸能满足人们内在的心理需要，因此不仅自尊与幸灾乐祸有关，其他心理需要，如控制感、归属感和存在感也与幸灾乐祸有关(Brambilla & Riva, 2017b)。

再者，疾病也会影响幸灾乐祸情绪。疾病方面，因为抑郁的人一般自我评价较低，因此较多研究者探讨了抑郁与幸灾乐祸的关系，结果发现重度抑郁的被试比中度抑郁的被试(Pietraszkiewicz & Chambliss, 2015)，中度抑郁的被试比非抑郁的被试(Chambliss et al., 2012)，更容易幸灾乐祸。跨文化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两者的关系(Chambliss & Pietraszkiewicz, 2016; 陈抗, 2017)。但是还有一种解释是，因为抑郁的人具有更强的竞争性，因此他们更易幸灾乐祸(Chambliss, 2016)。因而，虽然抑郁与幸灾乐祸的关系取得了较一致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抑郁与幸灾乐祸有关，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

此外，研究还提示幸灾乐祸情绪与腹侧纹状体活动有关，而亨廷顿氏舞蹈症(一种以舞蹈样动作伴认知和精神障碍为特点的疾病)早期会伴有腹侧纹状体受损，因此，患有这种疾病的被试更少幸灾乐祸(Baez et al., 2016; 2018)。因为纹状体也是一种奖励系统，这进一步提示幸灾乐祸可能与社交奖励有关(Baez et al., 2018)：通过他人的不幸，被试感到自己得到了某种好处。此外，高催产素水平与高幸灾乐祸有关，这提示了催产素基因和系统在调节幸灾乐祸情绪中的作用(Luo et al., 2015; Shamay-Tsoory et al., 2009)。

2.2　联结期

2.2.1　对不幸方的前期认知评价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研究认为幸灾乐祸源于社会比较，人们的情绪状态，不仅与自身情况有关，也与他人比较有关(Dvash & Shamay-Tsoory, 2011)。尼采认为与成功之人比较时，感到自身弱势的痛苦，使得人们对他们随后的失败感到幸灾乐祸(引自：Leach & Spears, 2008)。因此，人们更容易对社会地位(Lange & Boecker, 2019)或能力(Feather, 2012)比自己高的人的不幸感到开心。这属于一种上行比较。进一步地说，“吃瓜群众”的围观，除了猎奇与好事之外，幸灾乐祸似乎也如影随形，这是一种“看客们”常伴随的情绪。

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社会比较源于刻板印象，比较对象的真实社会地位或能力不一定很高，只是人们认为如此罢了。Fiske 等(2002)的刻板印象两因素模型，将刻板印象分为能力和温暖度，他们发现能力维度与幸灾乐祸有关，人们更容易对自己认为能力高的人所遭遇的不幸感到开心(Cikara & Fiske, 2014)。刻板印象是一种笼统的、概括的和固定的印象。有研究者认为当不幸

方被抹去个人化特征，即将不幸方非人化之后，他人更易认为这些非人化对象是不值得道德考量的，更易对其产生刻板印象和歧视，也更易对其不幸幸灾乐祸(Wang et al., 2019)。

然而，无论是上行比较还是刻板印象，当人们认为不幸方属于高能力或高地位者时，从心理上即将他们当作了优势群体。而这种优势发生于幸灾乐祸前。因此，本文将其称为前期的认知评价，严格来说，此时的不幸方并非不幸，而是“幸运”的。

可见，对不幸方的认知评价，不仅涉及对其本身的评价，还涉及对其前期之幸的评价。这些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 Heider (1958)的平衡理论，它认为应得性与行为评价及其后果评价的一致性有关。当行为被认为是不好/好的，且结果也是不好/好时，即−−或++，则该结果被认为是应得的；当行为被认为是不好/好的，但结果却是好/不好时，即−+或+−，则该结果被认为是不应当的。研究发现，将不幸者前期的幸事归于其不应得时，更易将其后期的不幸归于是其应得的，从而更易对其幸灾乐祸(如：Leyens et al., 2014; Shamay-Tsoory et al., 2014; 张爱卿 等, 2004)。这种应得性的判断显然与行为的合法性有关(Feather, 2014; van Dijk et al., 2005)。合法性可分为道德评价和法律评价两个层面，如果认为他人的行为是不合法或不道德的，他们因此行为获得的好处更易被认为是不应得的，而当他们因此行为遭遇不幸时，更易被认为是应得的，从而对此幸灾乐祸(Brambilla & Riva, 2017a; Santamaría-García et al., 2017)。

然而，相较于对后期不幸的认知评价研究来说(见下文 2.3)，对不幸方前期之幸的认知评价研究是少之又少的，仅从应得性和合法性两个方面有少量研究，也未将前期之幸与后期之不幸的认知评价做明确区分，虽然这两者可能是连续的过程，但不做明确区分，则难以回答究竟是对幸或不幸的评价影响了幸灾乐祸情绪，抑或两者的相互作用。

2.2.2 对不幸方的前期情绪

对不幸方的情绪的研究多且复杂，但大致可以分成 3 类：嫉妒、厌恶类和憎恨类。统观这些研究，它们实际上也是对不幸方的前期情绪，此时不幸方还处于心理上的优势地位，因而，这部分研究最多的是幸灾乐祸与嫉妒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幸灾乐祸是对他人不幸之开心，而嫉妒是对他人幸之不开心。亚里士多德说：“那些对他人之不幸幸灾乐祸的人，与嫉妒他人之幸的人是同一类人” (引自：van de Ven et al., 2015)。因此，Shamay-Tsoory 等人将这两种情绪当作是对立的情绪，并对它们予以区分和比较(例如：Shamay-Tsoory et al., 2009; Shamay-Tsoory et al., 2007)。但 Takahashi 等人发现这两者是有关联的，神经科学研究也发现嫉妒与幸灾乐祸都与前额纹状体网络，尤其是腹侧纹状体有关(例如：Jankowski & Takahashi, 2014; Takahashi et al., 2009)。

然而，更多的研究探讨的是前期的嫉妒是否是导致后期幸灾乐祸的原因(例如：Cikara & Fiske, 2013; Smith et al., 1996)。对此，却得到了颇不一致的结果。由此，研究者将嫉妒进行了分类，将其分成恶意的(malicious)和善意的(benign) (van de Ven et al., 2015)。这两类嫉妒都包含着意识到他人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挫败感，但是善意的嫉妒希望通过提升自己来消除挫败感，而恶意的嫉妒希望通过拉对方下水来让自己感觉好受。Lange 等(2018)的元分析发现，恶意的嫉妒与幸灾乐祸有关，但善意的嫉妒却没有这个关联。

在本文的分类下，厌恶类的情绪表示的是一种人际关系中远离的情绪，包括不喜欢(dislike; Hoogland et al., 2015)、厌恶(disgust; Powell & Smith, 2013)和诋毁(denigration; Feather & Naim, 2005)；憎恨类情绪表示的是人际关系中带有攻击性的情绪，包括攻击(aggression; Wang et al., 2019)、怨恨(resentment; Feather & Sherman, 2002)、敌意(hostile; Feather et al., 2013)和敌对(contentiousness; Chambliss, 2016)。当不幸者是人们厌恶或憎恨的人时，人们更易对他们的不幸幸灾乐祸；然而，当不幸者是人们喜爱的人时，人们不太会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Greenier, 2015; 赵轶然, 2015)。不仅如此，有一些研究发现，相比嫉妒，厌恶和憎恨类情绪更能预测随后的幸灾乐祸(例如：Feather & Naim, 2005; Feather & Sherman, 2002; Leach & Spears, 2008)。Berndsen 等(2017)还发现，当不幸者是憎恨的对象时，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会随之改变，哪怕他们不需要为不幸负责，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从而幸灾乐祸。但是，并没有研究将厌恶类情绪和憎恨类情绪分开探讨，以分辨它们对幸灾乐祸的影响程度

是否有区别。

2.2.3 人际或群际关系

人际或群际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因素(Leach et al., 2003)。例如, 当两方存在竞争或敌对关系时, 看到对方失败更易幸灾乐祸(Wang et al., 2019; 向晋辉 等, 2005)。若外群体遭遇不幸的方面正好是自己所在意或感兴趣的内容时, 幸灾乐祸的情绪将会更强烈。例如, Leach 等人(2003)发现, 对足球感兴趣的人, 相比对足球不感兴趣的人, 当看到对手失败时, 会更开心。此外, 关系的亲疏程度可能也有影响, 对陌生人所遭遇的不幸更开心(Piskorz & Piskorz, 2009)。

此外,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内群体认同也与人际/群际关系相关, 例如, 越认同内群体的个体, 可能更排斥外群体, 因而与外群体的关系更差; 而与外群体关系较好的个体, 也可能较不认同内群体(Jetten et al., 2020)。幸灾乐祸相关研究也发现, 内群体认同越高的个体, 当外群体遭遇不幸时, 更易幸灾乐祸(Combs et al., 2009; 冯夏影, 2015; Ouwerkerk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19)。Hoogland 等人(2015)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内群体认同会影响被试对群体得失的感知, 如果认为以前内群体失去的较多, 而在外群体遭遇不幸后内群体得到的较多, 则会更幸灾乐祸。因此, 本文推测这或许也与相对剥夺感(Runciman, 1996)有关, 即高内群体认同可能会导致高相对剥夺感, 而当外群体遭遇不幸后的幸灾乐祸, 有助于降低群体相对剥夺感。不过, 此方面尚未见到实证文献。

2.3 幸灾乐祸期：对后期不幸的认知评价

他人之不幸的严重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其的情绪反应。除前述暗黑人格倾向者以外, 研究发现, 当不幸较严重时, 普通被试幸灾乐祸的情绪会下降, 而转之以同情(Berndsen & Feather, 2016; Black, 2018)。这提示虽然幸灾乐祸有其自然而然的一面, 但实际上幸灾乐祸也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社会情绪, 在某种意义上, 彰显着人们心理反应的伦理道德阈限。

此外, 如前所述, 对不幸方前期之幸或后期之不幸的归因, 也会影响人们的情绪。Feather (2006)在 Heider (1958)的基础上提出幸灾乐祸的应得性理论：当人们认为他人的不幸是应得时, 会产生开心的情绪, 并且伴随着一种公平得到伸张(“苍天饶过谁”)的感觉。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有公平的需要, 从而将他人之不幸看成是对不良行为的一种惩罚。但是, 这种公平感也可能与他人之前所获得的东西(即前期之幸)有关。例如, Shamay-Tsoory 等人(2014)发现, 如果认为他人前期所获得的东西是不应得的, 则被试更倾向认为他人随后的不幸是应得的。Pietraszkiewicz (2013)发现, 人们有一种世界公平信念, 如果他人前期得到的东西威胁了被试的世界公平信念, 当这个人或这个群体遭遇不幸时, 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不幸是应当的, 或是因果报应, 而对此幸灾乐祸。

Powell 和 Smith (2013)的研究发现, 特别是当这种行为不仅是不合法的(如作弊), 且是他人之前所声称讨厌的, 但却随后因该行为被抓时, 被试对这种伪君子的不幸会感到更开心。日常生活中, 一句“哈哈, 活该！”, 即生动地反映了这样的情形。尼采认为, 为了享受他人不幸所带来的开心情绪, 人们会将幸灾乐祸合法化：因为不幸是不合法的, 幸灾乐祸则合法了(引自：Leach et al., 2003)。有证据显示, 4 岁的孩子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合法性判断(Schindler et al., 2015; Schulz et al., 2013)。

责任性也会影响应得性。如果被试认为不幸是不幸者自己造成的, 不幸者应对此负责, 则被试更倾向于认为此不幸是不幸者所应得的, 而更幸灾乐祸(Feather et al., 2013)。但也有研究未发现责任性与幸灾乐祸的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责任的划分不甚清楚, 或研究方法有差异所致(van Dijk et al., 2005)。

此外, 如果不幸是不幸方自己故意为之, 被试也会认为这种不幸是应得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更幸灾乐祸(Jensen de López & Quintanilla, 2019)。

3 幸灾乐祸后又如何？

3.1 幸灾乐祸的后果

幸灾乐祸的后果是什么, 它会带来什么影响, 是最近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可以将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分成 3 类：行为、决策和情绪。

如前所述, 人们认为幸灾乐祸与亲社会行为是相对的, 因此以前人们才将幸灾乐祸看作是一种不好、不道德的情绪。研究结果确实也发现, 当人们对某人或某个群体幸灾乐祸时, 人们也更不愿意(张爱卿 等, 2004)或更不可能去为他们提供

帮助(Black, 2018), 亲社会行为更少(Feather, 2003)。不仅如此, Spears 和 Leach (2008)总结了幸灾乐祸的行为后果, 通过一些实验和准实验研究, 发现幸灾乐祸会增加杀人行为。然而不一致的是, 高红梅和李萌(2018)发现被试对幸灾乐祸对象更加信任, 在信任博弈任务中, 给予幸灾乐祸对象的投资额反而更高。此外, 有研究发现, 人们倾向于与人分享让自己幸灾乐祸的消息, 而不是藏着, 因此幸灾乐祸会增加人们传播消息的行为, 散布有关他人不幸的消息(Dasborough & Harvey, 2017; Ouwerkerk et al., 2018)。但是有趣的是, Watanabe (2018)发现分享他人的不幸消息, 并不能提高自尊水平。

此外, 人们是相对理性的, 情绪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作为一种社会情绪, 幸灾乐祸也是如此。Steinbeis 和 Singer (2013)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 儿童的幸灾乐祸反应减少, 更倾向做出与公平有关的社会决策(例如在分配奖励时, 更讲究均匀)。这可能意味着幸灾乐祸与公平决策呈负相关。但是这种相关研究无法分辨是因为个人特质的影响, 还是幸灾乐祸的影响。而 Kramer 等(2011)的实验研究发现幸灾乐祸后, 人们倾向于做出更保守和安全的决策, 更不冒险, 这可能是因为幸灾乐祸会提醒人们有前车之鉴, 不要做出可能会导致消极结果的选择。

最后, 研究者认为幸灾乐祸伴随着一种道德评价, 因此它也可能会产生道德情绪, 如内疚(guilt)、羞愧(shame)和后悔(regret)等。研究发现, 如果幸灾乐祸后出现了道德情绪, 则原先的幸灾乐祸情绪会下降, 并且提高亲社会行为(Berndsen & Feather, 2016; Schindler et al., 2015)。但 Berndsen 等人(2017)发现, 幸灾乐祸后人们对自己的感觉要更好。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道德评价和道德情绪的中介作用有关。如果幸灾乐祸后, 感到这种反应不道德, 则会产生内疚等道德情绪, 与此同时, 幸灾乐祸会下降, 亲社会行为会提高; 相反, 如果没有产生道德评价和道德情绪, 则可能对自己感觉更好。

3.2 调整期

根据前述幸灾乐祸的后果研究, 本文认为幸灾乐祸后人们还会经历一个调整期, 幸灾乐祸后的道德评价和道德情绪可能进一步影响幸灾乐祸情绪及随后的行为与决策。但遗憾的是, 因为后果研究相对较少, 更未见有研究探讨影响其后道德评价和道德情绪的因素, 但它们却可能是有助于减少幸灾乐祸的情绪的关键因素。本文认为影响这两者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因素来说, 对自身要求更高, 或道德准则更强的个体, 可能幸灾乐祸后更易产生自己是“不对的”这种道德评价, 进而产生内疚等道德情绪, 从而降低幸灾乐祸情绪。对于外部因素来说, 他人对同一事情的反应和评价, 也可能会对个体的道德评价和情绪产生影响。例如, 如果个体在幸灾乐祸后, 发现他人都对此不幸方抱之以同情, 则个体也更可能产生道德评价和情绪, 而改变原有幸灾乐祸情绪。总的来说, 幸灾乐祸是一个动态可变化的过程, 但是目前缺少关于其后果和调整的研究。

4 一个互动过程模型

综合前面的论述, 本文认为幸灾乐祸情绪经历了 4 个阶段：自我认同期、联结期、幸灾乐祸期和调整期; 并因此初步尝试建立了一个互动过程模型。然而, 因为此模型是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 而以往研究多探讨的是单一的影响因素, 虽然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共同起作用, 但也仅限于少数几个因素之间。限于目前研究范围的局限, 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 结合一些理论概念, 对 4 个阶段内各影响因素的关系, 作了如下梳理, 以更进一步明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图 1)。

首先, 自我认同期是第一个阶段, A (幸灾乐祸方)的自身因素是幸灾乐祸的前期因素, 且会影响 A 与 B (遭遇不幸方)的互动和联结。但是, 本文将自身因素分成了自身特征(主要指人口学特征)与自我认同两部分, 因为虽然自我认同也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 但当我们与他人比较时, 他人的优劣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人口学特征, 却可能会影响自我认同的其他方面。根据 Feather 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 本文认为 A 的自身特征和前期的自我认同会影响 A 对 B 的认知评价, 以及 A 对 B 之幸的认知评价, 进而影响 A 后期的自我认同和此后的其他过程。也即, 自我认同影响联结, 而联结又会反过来作用于 A 的自我认同。然而, 因为自身特征基本在出生时就被决定, 它可能不仅会影响自我认同, 也会对整个幸灾乐祸的过程产生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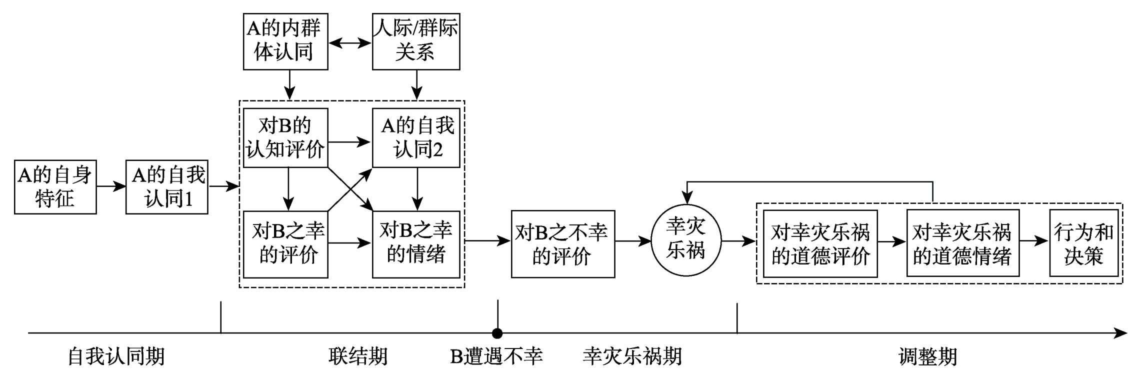


图 1　幸灾乐祸的互动过程模型
注：A 指幸灾乐祸方; B 指遭遇不幸方。

节作用。例如, van Dijk 等人(2006)发现当对方与自己同性时, 嫉妒才能显著预测幸灾乐祸。因此, 在模型中, 本文将自身特征作为第一个变量来体现。

第二个阶段是联结期, 它主要通过 3 条路径来作用于第三个阶段：幸灾乐祸期。第一条路径是通过 A 对 B 的前期认知评价, 来影响 A 对 B 前期之幸的情绪, 进而影响 A 对 B 后期之不幸的认知评价和随后的幸灾乐祸情绪。这条路径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关社会比较、嫉妒和应得性对幸灾乐祸影响的研究。例如, Brigham 等(1997)发现社会比较后, 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原先所嫉妒的对象现在所遭遇的不幸是应得的, 从而幸灾乐祸。然而, Feather 等人(2002; 2005)认为在前期比较的过程中, 感到对方比自己好的嫉妒之心并不会引起随后对其不幸的幸灾乐祸, 而是在比较时感到自己比对方差而带来的恨意能显著预测随后的幸灾乐祸。无论是嫉妒还是憎恨, 实际上属于 A 对 B 前期之幸的情绪, 而幸灾乐祸是属于当 B 不幸时的情绪。因而, 统合这些研究, 认为 A 对 B 的认知评价会影响对 B 之幸的情绪, 从而影响随后对 B 之不幸的认知评价, 进而影响当 B 不幸时的幸灾乐祸情绪(另可见：Berndsen et al., 2017; Cikara, 2010; Santamaría-García et al., 2017)。尽管向晋辉(2007)将幸灾乐祸分成情境反应性的(指当他人遭遇的不幸事件具有突发和滑稽性时产生的幸灾乐祸情绪)和态度投射性的(指因对不幸事件产生了认知, 且不幸事件符合观察者期望时产生的幸灾乐祸情绪), 发现仅后者受认知和情绪的影响, 而前者不受影响, 但因为其它研究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特点, 故而仍然认为第一条路径是存在的。

第二条路径则是经由 A 对 B 前期之幸的评价影响 A 对 B 前期之幸的情绪, 从而影响 A 对 B 不幸的评价和幸灾乐祸情绪。例如, Feather (2003)发现如果将他人前期之幸归因于是不应得的, 则会对其产生憎恨, 进而对其不幸幸灾乐祸。Powell 和 Smith (2013)进一步发现如果将他人前期之幸归因于是不道德的, 则会产生厌恶的情绪, 并将其不幸归因于是应得的, 从而幸灾乐祸。然而, 这两条路径中, A 对 B 的认知评价与 A 对 B 前期之幸的认知评价, 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尚未见到有直接的研究。但从理论上来说, 应是 A 对 B 的认知评价在先。

第三条路径则是通过 A 的内群体认同和人际/群际关系来影响幸灾乐祸情绪。但遗憾的是, 目前研究仅发现内群体认同和人际/群际关系对幸灾乐祸情绪有所影响, 却未见实证研究探讨其过程机制。可是理论上, 因为幸灾乐祸是在互动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性情绪, 内群体认同和人际/群际关系应该会对联结期的其他因素都有影响。这是第三条路径。本文将它们作为联结期的外围部分, 但它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也是一个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探讨的部分。

最后一个阶段是调整期, 幸灾乐祸后人们会产生对此情绪的道德评价, 进而影响道德情绪、行为和决策。如若产生了内疚、羞愧等道德情绪, 则可能会调整幸灾乐祸情绪。此外, 个体的道德准则等内部因素, 及他人对事件的反应等外部因素, 可能是影响道德评价的因素。

至此, 本文简单构建了 4 个阶段内部各因素

的关系，但是，这些因素和关系是建立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的，因为目前关于联结期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多，因此它们的内部关系也最复杂。然而，随着后续研究的发展，因素和关系也可能会随着调整和拓展。

5 模型优势及未来研究启示

总的来说，幸灾乐祸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目前的探讨却不够深入、系统。虽然哲学上早有对幸灾乐祸的讨论，但相比其他情绪，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着起步晚、焦点散、概念模糊、测量统一诸问题，这限制着该领域研究的拓深。曹红蓓等(2012)在总结了幸灾乐祸的相关研究后，认为其内容本应构成一个大致完整的链条，但研究点却都是散在的。本文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一个幸灾乐祸的 4 个阶段和互动过程模型，希冀对此领域的研究深化提供理论与进路框架启示。具体来说，该模型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该模型基于过程视角确立了幸灾乐祸的 4 个阶段和一列研究链条，并提示学界对幸灾乐祸的研究应注意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幸灾乐祸的产生势必与前期情境有关，若不注意事件发生的顺序，将可能导致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无法清晰阐明。在模型中，本文提出了 4 个阶段。而目前的研究常将前两个阶段混杂在一起，仅分离了不幸事件，探讨前两个阶段中的因素与幸灾乐祸的关系，甚至有研究者做的是横切研究。这可能是因为时间点前两个阶段相对来说确实较难分开。例如，因为社会阶层一直存在，人们似乎从出生就与其他地位群体产生了联结，有了对他们的认知和情绪。然而，从理论的探究上来说，如果不去厘清这些顺序，不去探讨自我认同及人们对不幸方前期之幸的认知评价和情绪对后期之不幸的认知评价和幸灾乐祸，研究者将无法具体解析幸灾乐祸情境因素的相互关系。现有研究者有的将某些情境因素(如嫉妒和幸灾乐祸)看作是并列的，而有的研究者则将它们看作是先后的，这种关系的不清楚恰缘于对先后顺序的考量不周。因此，今后研究者需关注更多情境因素的先后顺序，突出过程进路、多做过程性研究。

其次，该模型基于互动的视角融合了自身与他人因素，并提示研究者对幸灾乐祸的研究应关注情境中的多方互动。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幸灾乐祸势必不止涉及自身，也涉及他人。它是一种在两方或多方互动中产生的情绪，互动中的各方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一方面，自我认同可能在互动中发生变化。前期的自我认同可能会影响了之后对他人的评价和情绪，而对他人之幸的评价又可能进一步影响后期的自我认同。尽管某些自我认同相关的指标可能是相对稳定的，如自尊，但它仍然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增强或减弱。另一方面，自我认同也会影响对他人遭遇的觉知和情绪。例如当自尊心较低时，可能会更容易将他人之幸觉察为是不应得的，而产生更多憎恨的情绪。可见，他人的客观遭遇是一个触发因素，但也不能忽略对他人遭遇的主观觉知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所用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点，都更侧重于他人的客观遭遇，今后研究者可以从互动的角度，更多探讨自身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主观觉知的影响。

第三，该模型将幸灾乐祸的后果研究纳入进来，不仅关注幸灾乐祸的前期因素，也关注其后果和调整，提示幸灾乐祸是一个动态可变化的过程，但是目前缺少关于其后果和调整的研究，研究者需增加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可调整和改变幸灾乐祸的因素。例如，为什么有的人幸灾乐祸后会内疚，而有的人不会？影响这些道德评价和情绪的因素有什么？人们可以如何利用这些因素改变幸灾乐祸情绪？

第四，该模型采用了一个更中立的视角，仅探讨了幸灾乐祸产生和调整的过程，但不对幸灾乐祸是好是坏进行价值判断。这与以往一些研究者将幸灾乐祸当作一种不道德情绪，从而关注他们与暗黑人格等消极因素不同。在此，本文也呼吁研究者更多地去思考幸灾乐祸之所以能在全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原因和意义，也通过实证研究也检验这些意义。然而，对幸灾乐祸的后果研究却更关注于行为、决策、道德评价和道德情绪，但在社会层面，幸灾乐祸后是否有害于社会和谐，抑或促进社会公平？在群体层面，幸灾乐祸后会导致群际关系进一步恶化，抑或给人们以信号，促使人们做出补偿性行为来缓和群际关系？在个体层面，幸灾乐祸后个体的自尊心是否能得到提高，降低相对剥夺感，抑或增加道德负担和抑郁？这些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最后，该模型对其他社会情绪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如嫉妒、共情、乐他人之幸、伤他人之幸等。因为所有的社会情绪都是发生在至少两方的互动之中，因此，它们可能都会经历自我认同期、联结期、该社会情绪产生期和调整期。然而，因为本文重要关注的是幸灾乐祸情绪，其它社会情绪是否也会经历这 4 个阶段，各阶段内不同影响因素的关系是否有所不同，有待后续研究探索与求证。但是，尽管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至少该模型提示所有对社会情绪感兴趣的研究者：1)注重不同影响因素的发生顺序，多做过程性研究；2)尝试厘清互动双方或多方的不同影响因素，也探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3)关注社会情绪的后果，研究影响其改变的因素。

综上，本文尝试提出的 4 个阶段和互动过程模型，乃基于幸灾乐祸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所做出的初步尝试，这意味着该模型中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检验、修订和拓展，也意味着该模型还有诸多不足有待修订。但是该模型有助于检核和发现现有研究不足，并提示今后的研究宜给予幸灾乐祸前后事件的发生顺序、情境中的多方互动与幸灾乐祸的调整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曹红蓓，许燕，辛霞．(2012)．幸灾乐祸：人性“底部”的邪恶快感．*心理科学进展, 20*(3), 443−456.

陈抗. (2017)．抑郁、幸灾乐祸和同喜同乐三者间关系研究．*宿州学院学报,* (8), 44−47.

陈智勇．(2014)．*自我肯定对外群体幸灾乐祸的影响* (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冯夏影．(2015)．*群际视野下社会认同对幸灾乐祸的影响* (硕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高红梅，李萌．(2018)．幸灾乐祸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保定学院学报, 31*(2), 106−110.

桂菲菲．(2009)．幸灾乐祸情绪研究现状．*科教导刊,* (17), 179−180.

桂菲菲．(2010)．*幸灾乐祸情绪的脑机制研究* (硕士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方文 译)．上海：三联书店．

李翠．(2019)．*妒忌对幸灾乐祸的影响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 (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洛克. (1959)．*人类理解论(上)*．北京：商务印书馆．

向晋辉．(2007)．*幸灾乐祸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硕士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向晋辉，张庆林，赵玉芳．(2005)．个体间幸灾乐祸情感反应的影响因素及其内隐性．*中国临床康复,* (20), 113−115.

张爱卿，周方莲，刘华山．(2004)．责任归因、幸灾乐祸与帮助意愿的关系．*心理科学, 27*(1), 220−222.

赵轶然．(2015)．*共情还是幸灾乐祸?——当喜爱或愤恨的人发生负性事件时的大脑活动* (硕士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朱千林，魏峰，杜恒波．(2020)．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选择：情绪和目标互依性的作用．*外国经济与管理, 42*(6), 86−98.

Abell, L., & Brewer, G. (2018). Machiavellianism and schadenfreude in women’s friendship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1*(5), 909–919. https://doi.org/10.1177/0033294117741652

Baez, S., Pino, M., Berrío, M., Santamaría-García, H., Sedeño, L., García, A. M., ... Ibáñez, A. (2018). Corticostriatal signatures of schadenfreude: Evidence from Huntington’s disease.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 Psychiatry, 89*(1), 112–116. https://doi.org/10.1136/jnnp-2017-316055

Baez, S., Santamaría-García, H., Orozco, J., Fittipaldi, S., García, A. M., Pino, M., & Ibáñez, A. (2016). Your misery is no longer my pleasure: Reduced schadenfreude in Huntington’s disease families. *Cortex: A Journal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Nervous System and Behavior, 83*, 78–85. https://doi.org/10.1016/j.cortex.2016.07.009

Baren, A. (2017). *Why some take pleasure in other people’s pain: The role of attachmen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n Schadenfreude*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erndsen, M., & Feather, N. T. (2016). Reflecting on schadenfreud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a misfortune for which one is not responsible diminish previously expressed schadenfreude; The role of immorality appraisals and moral emotion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40*(6), 895–913.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6-9580-8

Berndsen, M., Tiggemann, M., & Chapman, S. (2017). “It wasn’t your fault, but ...”: Schadenfreude about an undeserved misfortun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41*(6), 741–748.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7-9639-1

Black, P. J. (2018). *The cognitive antecedents and behavioural consequences of schadenfreude in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oecker, L., Likowski, K. U., Pauli, P., & Weyers, P. (2015). The face of schadenfreude: Differentiation of joy and schadenfreude by electromyography. *Cognition and Emotion, 29*(6), 1117–1125.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4.966063

Brambilla, M., & Riva, P. (2017a). Predicting pleasure at others' misfortune: Morality trumps sociability and competence in driving deservingness and schadenfreud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41*(2), 243–253.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6-9594-2

Brambilla, M., & Riva, P. (2017b). Self - image and schadenfreude: Pleasure at others' misfortune enhances satisfaction of basic human need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4), 399–411. https://doi.org/10.1002/ejsp.2229

Brigham, N. L., Kelso, K. A., Jackson, M. A., & Smith, R. H. (1997). The roles of invidious comparisons and deservingness in sympathy and Schadenfreude.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3), 363–380. https://doi.org/10.1207/15324839751037011

Chambliss, C. (2016). Explaining the schadenfreude and freudenfreude features of depression: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depression, competitiveness, contentiousness, freudenfreude, and schadenfreude. In C. Chambliss & A. C. Hartl (Eds.), *Empathy rules: Depression, schadenfreude and freudenfreude: Research on depression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pp. 155–173). Chambliss, Catherine, Ursinus College, Collegeville, PA, U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Chambliss, C., Cattai, A., Benton, P., Elghawy, A., Fan, M., Thompson, K., … Tanenbaum, J. (2012). Freudenfreude and Schadenfreude Test (FAST) scores of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undergraduat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1*(1), 115–116. https://doi.org/10.2466/02.07.21.PR0.111.4.115-116

Chambliss, C., & Hartl, A. C. (2016). Nice and mean: How freudenfreude and schadenfreude shape relationships. In C. Chambliss & A. C. Hartl (Eds.), *Empathy rules: Depression, schadenfreude and freudenfreude: Research on depression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pp. 1–33). Chambliss, Catherine, Ursinus College, Collegeville, PA, U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Chambliss, C., & Pietraszkiewicz, A. (2016). Something new: Integrating the etiological role of schadenfreude and freudenfreude. In C. Chambliss & A. C. Hartl (Eds.), *Empathy rules: Depression, schadenfreude and freudenfreude: Research on depression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pp. 137–153). Chambliss, Catherine, Ursinus College, Collegeville, PA, U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Cikara, M. (2010). *Stereotypes and Schadenfreude: Behavioral and neural markers of pleasure at another's misfortune*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Cikara, M., & Fiske, S. T. (2013). Their pain, our pleasure: Stereotype content and schadenfreud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299*(1), 52–59. https://doi.org/10.1111/nyas.12179

Cikara, M., & Fiske, S. T. (2014). Stereotypes and schadenfreude. In W. W. van Dijk & J. W. Ouwerkerk (Eds.), *Schadenfreude: Understanding pleasure at the misfortune of others.* (pp. 151–169).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084246.013

Colyn, L. A., & Gordon, A. K. (2013). Schadenfreude as a mate-value-tracking mechanism.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3), 524–545.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2012.01422.x

Combs, D. J. Y., Powell, C. A. J., Schurtz, D. R., & Smith, R. H. (2009). Politics, schadenfreude, and ingroup identification: The sometimes happy thing about a poor economy and deat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635–646.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9.02.009

Crysel, L. C., & Webster, G. D. (2018). Schadenfreude and the spread of political misfortune. *PLoS ONE, 13*(9), 1–28.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1754

Dasborough, M., & Harvey, P. (2017). Schadenfreude: The (not so) secret joy of another's misfortun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1*(4), 693–707.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16-3060-7

Dvash, J., & Shamay-Tsoory, S. C. (2011). Envy and Schadenfreude: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mpetitive emotions. In R. Ebstein, S. G. Shamay-Tsoory, & S. H. Chew (Eds.), *From DNA to social cognition*. (pp. 139–155).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101803.ch9

Feather, N. T. (2003). Tall poppies and schadenfreud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5*(1958), 41–42.

Feather, N. T. (2006). Deservingness and emotions: Applying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deservingness to the analysis of affective reactions to outcome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7*(1), 38–73. https://doi.org/doi:10.1080/10463280600662321

Feather, N. T. (2008). Effects of observer's own status on reactions to a high achiever's failure: Deservingness, resentment, schadenfreude, and sympath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0*(1), 31–43. https://doi.org/10.1080/00049530701458068

Feather, N.T. (2012). Tall poppies, deservingness and schadenfreude. *The Psychologist, 25*(6), 434–437.

Feather, N. T. (2014). Deservingness and schadenfreude. In W. W. van Dijk & J. W. Ouwerkerk (Eds.), *Schadenfreude: Understanding pleasure at the misfortune of others.* (pp. 29–57).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084246.004

Feather, N. T, & Naim, K. (2005). Resentment, envy,

schadenfreude, and sympathy: Effects of own and other's deserved or undeserved statu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2), 87–102. https://doi.org/10.1080/00049530500048672

Feather, N. T, & Sherman, R. (2002). Envy, resentment, Schadenfreude, and sympathy: Reactions to deserved and undeserved achievement and subsequent failur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7), 953–961. https://doi.org/10.1177/01467202028007008

Feather, N. T, Wenzel, M., & McKee, I. R. (2013). Integra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schadenfreude: The role of deservingness and emotion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7*(3), 574–585.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2-9331-4

Fiske, S. T., Cuddy, A. J. C., Glick, P., & Xu, J. (2002).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6), 878–90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2.6.878

Frijda, N. (1988). The laws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5), 349–358.

Gonzalez-Gadea, M. L., Ibanez, A., & Sigman, M. (2018). Schadenfreude is higher in real-life situations compared to hypothetical scenarios. *PLoS ONE, 13*(10), 15–1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5595

Greenier, K. D. (2015). Seeing you fall vs taking you down: The roles of agency and liking in schadenfreud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6*(3), 941–953. https://doi.org/10.2466/21.PR0.116k31w7

Greenier, K. D.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chadenfreude in hypothetical versus live situation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1*(3), 445–458. https://doi.org/10.1177/0033294117745562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Hoogland, C. E., Ryan Schurtz, D., Cooper, C. M., Combs, D. J. Y., Brown, E. G., & Smith, R. H. (2015). The joy of pain and the pain of joy: In-group identification predicts schadenfreude and gluckschmerz following rival groups' fortun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9*(2), 260–281.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4-9447-9

Jankowski, K. F., & Takahashi, H. (2014).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social emo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psychopathology: Examining embarrassment, guilt, envy, and schadenfreude.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68*(5), 319–336. https://doi.org/10.1111/pcn.12182

Jensen de López, K. M., & Quintanilla, L. (2019). The role of severity and intentionality in the intensity of schadenfreude attribution: A developmental study of danish childre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111/sjop.12548

Jetten, J., Reicher, S. D., Haslam, A., & Cruwys, T. (2020). *Together apart: The psychology of COVID-19*. London: SAGE.

Kramer, T., Yucel-Aybat, O., & Lau-Gesk, L. (2011). The effect of schadenfreude on choice of conventional versus unconventional op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6*(1), 140–147.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10.11.010

Krizan, Z., & Johar, O. (2012). Envy Divides the Two Faces of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0*(5), 1415–1451.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12.00767.x

Lange, J., & Boecker, L. (2019). Schadenfreude as social-functional dominance regulator. *Emotion, 19*(3), 489–502.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454

Lange, J., Weidman, A. C., & Crusius, J. (2018). The painful duality of envy: Evidence for an integrative theory and a meta-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of envy and schadenfreud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4*(4), 572–598.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118

Leach, C. W., & Spears, R. (2008). "A vengefulness of the impotent": The pain of in-group inferiority and schadenfreude toward successful out-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6), 1383–1396. https://doi.org/10.1037/a0012629

Leach, C. W., Spears, R., Branscombe, N. R., & Doosje, B. (2003). Malicious pleasure: Schadenfreude at the suffering of another grou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5), 932–94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4.5.932

Leach, C. W., Spears, R., & Manstead, A. S. R. (2015). Parsing (malicious) pleasures: Schadenfreude and gloating at others' advers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201.

Lee, S. A. (2019). The Dark Tetrad and callous reactions to mourner grief: Patterns of annoyance, boredom, entitlement, schadenfreude, and hum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7*, 97–100.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8.08.019

Leyens, J.-P., Cortes, B. P., ColLange, J., & de Renesse, E. (2014). Humanizing outgroups does not lead to stress but to Schadenfreude. *TPM-Testing, Psychometrics, Methodology in Applied Psychology, 21*(3), 341–348.

Luo, S., Li, B., Ma, Y., Zhang, W., Rao, Y., & Han, S. (2015). Oxytocin receptor gene and racial ingroup bias in empathy-related brain activity. *NeuroImage, 110*, 22–31.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5.01.042

Ouwerkerk, J. W., & van Dijk, W. W. (2008). *Why do we laugh at Idols? Self-evaluation and schadenfreude following another's misfortune in the medi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Ouwerkerk, J. W., van Dijk, W. W., Vonkeman, C. C., & Spears, R. (2018). When we enjoy bad news about other groups: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to out-group schadenfreude.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21*(1), 214–232.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16663018

Pietraszkiewicz, A. (2013). Schadenfreude and just world belief.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3), 188–194. https://doi.org/10.1111/ajpy.12020

Pietraszkiewicz, A., & Chambliss, C. (2015). The link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chadenfreude: Further evidenc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7*(1), 181–187. https://doi.org/10.2466/02.PR0.117c11z3

Piskorz, J. E., & Piskorz, Z. (2009). Situational determinants of envy and schadenfreude. *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0*(3), 137–144. https://doi.org/10.2478/s10059-009-0030-2

Porter, S., Bhanwer, A., Woodworth, M., & Black, P. J. (2014). Soldiers of misfortune: An examination of the Dark Triad and the experience of schadenfreu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7*, 64–6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3.11.014

Powell, C. A. J., & Smith, R. H. (2013). Schadenfreude caused by the exposure of hypocrisy in others. *Self and Identity, 12*(4), 413–431.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12.687013

Runciman, W.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antamaría-García, H., Baez, S., Reyes, P., Santamaría-García, J. A., Santacruz-Escudero, J. M., Matallana, D., ... Ibáñez, A. (2017). A lesion model of envy and Schadenfreude: Legal, deservingness and moral dimensions as revealed by neurodegeneration. *Brain, 140*(12), 3357–3377. https://doi.org/10.1093/brain/awx269

Sawada, M., & Hayama, D. (2012). Dispositional vengeance and anger on schadenfreud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1*(1), 322–334. https://doi.org/10.2466/16.07.21.PR0.111.4.322-334

Schindler, R., Körner, A., Bauer, S., Hadji, S., & Rudolph, U.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chadenfreude and sympathy: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PLoS ONE, 10*(10), e0137669.

Schulz, K., Rudolph, A., Tscharaktschiew, N., & Rudolph, U. (2013). Daniel has fallen into a muddy puddle—Schadenfreude or sympathy?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4), 363–378. https://doi.org/10.1111/bjdp.12013

Shamay-Tsoory, S. G., Ahronberg-Kirschenbaum, D., & Bauminger-Zviely, N. (2014). There is no joy like malicious joy: Schadenfreude in young children. *Plos ONE, 9*(7), e100233.

Shamay-Tsoory, S. G., Fischer, M., Dvash, J., Harari, H., Perach-Bloom, N., & Levkovitz, Y. (2009).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oxytocin increases envy and schadenfreude (gloating). *Biological Psychiatry, 66*(9), 864–870.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09.06.009

Shamay-Tsoory, S. G., Tibi-Elhanany, Y., & Aharon-Peretz, J. (2007). The green-eyed monster and malicious joy: The neuroanatomical bases of envy and gloating (schadenfreude). *Brain: A Journal of Neurology, 130*(6), 1663–1678. https://doi.org/10.1093/brain/awm093

Smith, R. H., Turner, T. J., Garonzik, R., Leach, C. W., Urch-Druskat, V., & Weston, C. M. (1996). Envy and Schadenfreud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2), 158–16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6222005

Spears, R., & Leach, C. W. (2008). Why neighbors don't stop the killing: The role of group-based schadenfreude. In V. M. Esses & R. A. Vernon (Eds.), *Explaining the breakdown of ethnic relations: Why neighbors kill*. (pp. 93–120).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2/9781444303056.ch5

Steinbeis, N., & Singer, T. (2013).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social emotions and behavior during childhood: The ontogeny of envy and Schadenfreude predicts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equity-related decis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5*(1), 198–209.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12.11.009

Takahashi, H., Kato, M., Matsuura, M., Mobbs, D., Suhara, T., & Okubo, Y. (2009). When your gain is my pain and your pain is my gain: Neural correlates of envy and Schadenfreude. *Science, 323*(5916), 937–93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65604

van de Ven, N., Hoogland, C. E., Smith, R. H., van Dijk, W. W., Breugelmans, S. M., & Zeelenberg, M. (2015). When envy leads to schadenfreud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9*(6), 1007–1025.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4.961903

van Dijk, W. W., Ouwerkerk, J. W., & Goslinga, S. (2009). The impact of deservingness on schadenfreude and sympathy: Further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9*(3), 390–392. https://doi.org/10.3200/SOCP.149.3.390-392

van Dijk, W. W., Ouwerkerk, J. W., Goslinga, S., & Nieweg, M. (2005). Deservingness and Schadenfreude. *Cognition and Emotion, 19*(6), 933–939.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541000066

van Dijk, W. W., Ouwerkerk, J. W., Goslinga, S., Nieweg, M., & Gallucci, M. (2006). When people fall from grace: Reconsidering the role of envy in schadenfreude. *Emotion, 6*(1), 156–160. https://doi.org/10.1037/1528-3542.6.1.156

van Dijk, W. W., Ouwerkerk, J. W., & Smith, R. H. (2015). Schadenfreude as a mate-value-tracking mechanism: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Colyn and Gordon (2013).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2*(2), 299–307. https://doi.org/10.1111/pere.12081

van Dijk, W. W., Ouwerkerk, J. W., Smith, R. H., & Cikara, M. (2015). The role of self-evaluation and envy in schadenfreude.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6*(1), 247–282. https://doi.org/10.1080/10463283.2015.1111600

van Dijk, W. W., Ouwerkerk, J. W., van Koningsbruggen, G. M., & Wesseling, Y. M. (2012). "So you wanna be a pop star?": Schadenfreude following another's misfortune on TV.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4*(2), 168–174. https://doi.org/10.1080/01973533.2012.656006

van Dijk, W. W., van Koningsbruggen, G. M., Ouwerkerk, J. W., & Wesseling, Y. M. (2011). Self-esteem, self-affirmation, and schadenfreude. *Emotion, 11*(6), 1445–1449. https://doi.org/10.1037/a0026331

Wang, S., Lilienfeld, S. O., & Rochat, P. (2019). Schadenfreude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A tripartite motivational model.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52*, 1–11. https://doi.org/10.1016/j.newideapsych.2018.09.002

Watanabe, H. (2016). Effects of self-evaluation threat on schadenfreude toward strangers in a reality TV show.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8*(3), 778–792. https://doi.org/10.1177/0033294116648767

Watanabe, H. (2018). Sharing schadenfreude and late adolescents' self-esteem: Does sharing schadenfreude of a deserved misfortune enhance self-este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4*(4), 438–446. https://doi.org/10.1080/02673843.2018.1554500

Reconsideration of Schadenfreude and a proposal of an interactive process model

ZHANG Yan[1], WANG Junxiu[1], XI Juzhe[2,3]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Affiliated Mental Health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335, *China*)

Abstract: Schadenfreude is a social emotion involving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or joy arising from learning about other people's misfortunes. Although it is regarded as universally prevalent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research about it. While it used to be posited immoral, recent scholars have considered it to be meaningful and have undertaken research about it. In this essa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ere reviewed,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of Schadenfreude were summarized, and an interactive process model (IPM) was proposed. The strength of the model lies in that it integrated factors of both parties in interaction (the self and the others) based on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and it clarified the process of and the change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Schadenfreude based on a process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model,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exts and inter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Schadenfreude. The model may also assist our understanding of studies on other social emotions.

Key words: Schadenfreude, interactive process model, social emotion